

日治時期臺灣初等學校課後補習經驗初探

蔡元隆* 朱啟華**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臺灣日治時期(1927-1945年)初等學校(含小學校、公學校及國民學校)放學後的補習經驗。本研究採用口述歷史方法，針對十三名日治時期的教師、畢業校友取得口述資料，並輔以相關的口述歷史叢書作為研究工具，另外使用質性分析軟體 ATLAS.ti 進行編碼分類與資料管理。歸納研究有六點結論：第一，小學校或公學校普遍存在著課後補習的現象，但小學校的現象則較少。第二，小學校少有課後補習的原因，極有可能是其占有資源上的優勢。第三，小學校或公學校課後補習都是免費，教師並無收取任何酬勞。第四，日籍教師的課後補習件數呈現較多，原因是因為高年級普遍是日籍教師擔任。第五，除了校園中的課後補習，也有到教師宿舍補習及出錢集資補習的兩種情形。第六，補習目的不只是希望學生考上理想的學校，更是教師間展現個人教學能力的指標。

關鍵詞：初等學校、課後補習、教學能力、日治時期臺灣教育

* 本文第一作者(通訊作者)為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 本文第二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副教授

E-mail: tommyorlevis@yahoo.com.tw

壹、前言

揆諸反思後殖民思潮的今日，研究日治時期的臺灣教育史已漸漸成為一塊被注目的範疇，在近二十年對臺灣日治時期的研究中，都是將焦點置於教育制度、課程與教學、教科書、教學活動等（吳文星，2000，2001；何義麟，1986；李穗嘉，1990；林玉体，2003；周婉窈，1997，2001；許佩賢，1994，1996，2005；蔡錦堂，2006；鄭梅淑，1988），其中又以研究教育制度最為普遍（吳文星，2000，2001；蔡元隆，2007）。但近年來受到教育社會學關注的焦點—文化研究，對於日治時期校園中的生活經驗已經開始重視與投入研究，從靜態的法制、教科書及課程內容，到動態的校園生活、跨文化體驗，這樣的研究取向與思維的改變也讓許多臺灣的教育學者、歷史學者跳脫了舊有的知識框架，對瞭解與研究臺灣教育史而言更是向前邁進一大步。

國內對於日治時期以校園為生活經驗的研究或專書部分可說是寥若晨星，僅有部分探討校史研究時曾提及，不然就是分散於各自傳、回憶錄、耆老口述叢書中，且往往只是幾行字的描述，缺乏深入地描繪校園中動態的氛圍與活動現象。由於校園生活經驗範圍過於廣泛，舉凡師生互動、學生互動、教室的教學現象、學生學習概況、課後補習、下課時間等等，均可列為校園生活經驗的一部分。而本文將針對日治時期校

園生活經驗的一部分—「課後補習經驗」，作相關的探討與瞭解。此外，研究者為了補足這類研究的不足，除了嘗試以現有的口述歷史叢書及文獻作為分析與詮釋資料外，還以口述歷史的方式針對十三位在日治時期服務的臺日籍教師或畢業校友取得珍貴的口述訪談。故本研究欲提出四個問題進行瞭解：一、小學校中的日籍教師與臺日籍團仔的補習經驗為何？二、公學校中的臺日籍教師與臺籍團仔的補習經驗為何？三、兩種學制的補習型態中是否有差別之處？四、臺日籍教師補習的目的為何？

在研究限制上，1941 年以前的初等學校應包含有小學校及公學校。公學校係指專為臺灣團仔的初等教育設立的學校，而專為日本團仔初等教育設立的學校則為小學校，但仍有極少數的臺灣團仔就讀；在公學校中有臺籍及日籍教師，但在小學校中只有日籍教師（侯相如、蔡元隆，2008b）。公學校是臺灣總督府在 1898 年將原本在 1896 年設立的國語傳習所一律改制為公學校，直到 1941 年 2 月 29 日頒布國民教育令，接著 3 月 26 日以勅令第二五五號修正「臺灣教育令」，將臺灣的初等教育一律改為「國民學校令」實施，並在同年 4 月 1 日實施國民學校令（佐藤源治，1943）。也就是將原本小學校及公學校雙軌制一律改為日治後期我們所稱的「國民學校」。故本研究所指的初等學校的範圍則是包含小學校、公學校及國民學校。

貳、文獻探討

一、日治時期課後補習的概念釐清與重新定義

所謂「課後」廣義而言，包括所有學生不在國民小學上課的時間，進一步細分包括每天放學後的時間、週休二日不上課的時間、放假時間（李新民，2001）。而「課後補習」的法規定義，依據2004年6月23日修正之「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三條規定，短期補習教育的對象為志願增進生活知能之國民，都可以參加。而第六條規定中提到，短期補習教育由學校、機關、團體或私人辦理，分技藝補習班及文理補習班二類；修業期限為一個月至一年六個月（教育部，2004）。換言之，「課後補習」即學生放學之後參與學校開辦和民間開辦的所有相關學習課程之教學，其包括學業補習、才藝補習和托育安親三個部分（李苑蓓，2007）。簡言之，張春桂（2005）認為「課後補習」即學童放學後所參與非學校正規課程之教育。

但上述之課後補習行為有涉及金錢上之給付，與日治時期文獻中所記載之課後補習行為的意涵不符。因本研究訪者及諸多自傳、回憶錄、耆老口述叢書均提及日治時期不管臺、日籍教師的課後補習都不收取任何費用（許毓凌，2007；謝佩錦，2005），再加上研究者查證相關之文獻，並無專文或日治時期的文獻針對「日治時期課後補習」

一詞作詳細的研究或論述，但本研究之研究主軸為「日治時期課後補習」，故本研究對於「課後補習」之意涵及概念須進行適當的釐清與定義，所以綜合上述之論述，本研究之「日治時期課後補習」一詞，乃指學生及教師在正規的學校教育放學後，不管是在老師家或在學校實施課後的學習行為。

二、日治時期課後補習相關文獻探討

由於臺灣在日治時期課後補習研究上，目前尚未有專書或相關文章作深入的探討與研究。關於課後補習的零散敘述分別散落在自傳、回憶錄、耆老口述叢書中，故我們僅能從這些文獻中整理與歸納。研究者從這些資料中發現日治時期小學校及公學校大部分都有存在著課後補習現象（臺東縣後山文化工作協會，1999；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主編，1997；何憶如，2003；吳枝坤，2005；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6；張炎憲編，1996；許毓凌，2006，2007；黃文樹，2002；楊明義，1987；劉書彥，1996；謝佩錦，2005）。

謝佩錦（2005）與許毓凌（2007）的研究均指出，日治時期如果臺灣囡仔想要繼續升學，五、六年級的臺日籍教師通常會將其留下來義務幫忙補習，許多回憶錄及訪談錄的初等學校學生，都對這段記憶印象深刻，並且感謝當時的教師分文不收，經常

在課後為學生義務補習。但也有極少數的受訪者在文獻中表示日治時期並未經歷課後補習的經驗（張炎憲編，1996；許毓凌，2006，2007）。以上為概括性的陳述，詳細說明將在結果與討論時說明之。

參、研究方法

由於口述歷史者是親身經歷的厚實描述，因而本研究採用口述歷史方法取得資料的來源，並輔以相關口述歷史叢書的分析作為主要研究方式，以下分三個部份說明之：

一、研究受訪者

本研究透過關鍵人物（key person）的方式尋訪了十三位經歷日治時期（1927-1945年）服務於初等學校的老師或畢業校友有相關課後補習經驗的耆老作詳細的口述歷史。且為了提升研究的可信度，同時也考慮了口述者的健康狀態，因為隨著年齡增加在生理上的損壞會影響到口述的真實性。故本研究所尋訪的十三位口述者的健康狀況在受訪者同意下，可列出健康狀況如下表（表 3-1）。

表 3-1 十三位教師或畢業校友基本介紹

¹ 在日治時期服務或畢業學校欄位中我們發現有部分小學校並非是某國小的前身，是因為小學

蔡元隆 朱啟華

姓名	性別	年齡	日治時期服務 或就讀時期	日治時期服務或畢業學 校	角色	健康 狀態
許台	男	83	1943-1945年	臺南州官田鄉第二國民 學校(現今臺南縣官田國 小)	教師	腿傷
楊秀竹	女	89	1929-1935年	臺南州嘉義女子公學校 (現今嘉義市大同國小)	學生	良好
蔡廷賢	男	90	1927-1933年	臺南州頂六公學校(現今 嘉義縣頂六國小)	學生	良好
張岳揚	男	88	1929-1935年	臺南州玉川公學校(現今 嘉義市崇文國小)	學生	良好
吳五田	男	76	1942-1945年	高雄州里港公學校(里港 東國民學校)(現今屏東 縣里港國小)	學生	良好
賴彰能 (廣瀨時雄) ²	男	84	1932-1938年	臺南州東門公學校(現今 嘉義市民族國小)	學生	眼疾
曾煥烈 (瀧山輝男)	男	85	1930-1938年 (含二年高等 科)	臺南州旭小學校	學生	良好
			1943-1945年	澎湖廳小池角國民學校 (現今澎湖縣池東國 小)、澎湖廳大嶼國民學 校(現今澎湖縣七美國 小)	老師	
徐寬宏	男	82	1934-1940年	臺南州若葉小學校	學生	良好
江滿足	女	83	1933-1939年	臺南州若葉小學校	學生	良好
邱炳煌	男	85	1930-1938年	臺南州阿里山小學校(現	學生	良好

校基本上是日人就讀之學校，所以在戰敗後，日人遷回內地，導致許多小學校閒置或廢校，但仍有部份小學校更改為中等學校，因為小學校在設備上是優於公學校，所以有部分小學校場址仍有被延用。

² 表格中賴彰能及曾煥烈有日文名字是因為他們兩人在日治皇民化時期曾更改過日本姓名。

日治時期臺灣初等學校課後補習經驗初探

			1944-1945 年	今嘉義縣香林國中) 澎湖廳望安國民學校將軍澳分教場(現今澎湖縣將軍國小)	教師	
歐 識	女	81	1935-1941 年	臺南州玉川公學校(現今嘉義市崇文國小)	學生	良好
永野好德	男	85	1930-1938 年 (含二年高等科)	臺南州旭小學校	學生	良好
			1943-1945 年	臺南州新高國民學校(現今嘉義市林森國小)	教師	
佐藤玉枝	女	91	1927-1933 年	臺南州新營小學校、臺南州大林小學校(現今嘉義縣大林國中)	學生	手指 痠縮
			1939-1945 年	臺南州玉川國民學校(現今嘉義市崇文國小)	教師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資料的蒐集

研究者將以口述歷史的方式採用半結構式訪談，針對十三位日治時期（1927-1945年）的教師及畢業學生分別擬訂訪談大綱。本研究的訪談時間經與十三位訪談者³協調後，於每個星期一早上由研究者親自到受訪者家中進行二至三次訪談，且訪談時間至少一小時。另外還透過國家圖書館、地方文獻、及各國小蒐集有關日治時期相關的一

³ 兩位日籍受訪者將以書信的訪談方式進行，如遇到無法理解的字句將會以越洋電話進行再一次的瞭解與訪談。所以此處正確施以口述訪談的人數應為十一位。

手課後補習資料，和接受口述歷史者所提供的文件如：日誌、記事本、照片等貴重的私人物品。

三、資料的分析

本研究資料的蒐集，主要是採取口述歷史的方法及類似的口述歷史叢等作為研究依據。以下說明如何分析整理這兩種資料來源：

(一) 口述歷史的分析

本研究採用質性軟體ATLAS.ti 5.0版作為輔助工具進行資料的管理與編碼，以下詳細說明之：

1. 逐字稿的抄謄及整體閱讀

研究者首先將每一份訪談錄音內容謄寫成逐字稿，成為日後閱讀及分析的文本。在謄寫逐字稿前，研究者先紀錄文本編號、受訪時間及訪談地點等，謄寫時，研究者反覆聽錄音帶內容，一字不漏的將其轉化成文字。接著將謄寫完畢的文本列印之後，做每份文本初次的整體閱讀，秉持著客觀的角度視野、遠離先前刻板印象及經驗詮釋，儘量融入受訪者的情境脈絡中。

2. 進行編碼

日治時期臺灣初等學校課後補習經驗初探

本研究使用質性軟體ATLAS.ti 5.0版作為輔助工作進行編碼。首先按照訪談對象分為教師與畢業校友兩類，教師代碼為「A」、畢業校友為「B」，分別獨立編號如(表3-2)。第一位教師為「A-1」，接著第一位畢業校友為「B-1」，最後一碼為訪談次數。並在編碼時給予標示如「集資出錢補習」註記，例如「A-1-1 集資出錢補習」。

表3-2 編碼表

身份	姓名	代碼
教師	許台	A-1
	曾煥烈	A-2
	邱炳煌	A-3
	永野好德	A-4
	佐藤玉枝	A-5
學生	楊秀竹	B-1
	賴彰能	B-2
	曾煥烈	B-3
	邱炳煌	B-4
	永野好德	B-5
	佐藤玉枝	B-6
	蔡廷賢	B-7
	張岳揚	B-8
	吳五田	B-9
	徐寬宏	B-10
	江滿足	B-11
	歐 識	B-1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 口述歷史叢書的分析

口述歷史叢書的文獻部分，會將文中的口述字句作適當的編碼，並將之採以系統式的編排佐證方式融入相關的訪談內容中，並與訪談內容作前後的脈絡性連結，讓此研究能更充實與深入。

肆、結果與討論

一、小學校的課後補習經驗

小學校的學制是專為日本團仔設置的初等教育制度，主要是用來區別與專為臺灣團仔設置的公學校，但在臺學共制的教育政策下，也有極少數的臺灣團仔就讀於其中。換言之，就讀於小學校經驗的臺灣團仔，自然就會與就讀公學校的臺灣團仔有所不同。而跨文化的補習經驗，對當時的臺灣團仔來講，也就成了一種很特別的學校生活經驗。不過從自傳、回憶錄、耆老口述叢書及訪談內容中，發現小學校的課後補習經驗呈現不多的情形，如許毓凌在(2006)《日治時期小學校臺灣兒童的跨文化經驗》的碩士論

日治時期臺灣初等學校課後補習經驗初探

文中提及一位林姓受訪者對於小學校補習經驗⁴：

求學時期並沒有參加課後的補習，都是自己自修為主，其他小學校的同學，也許家中較富裕的像林 XX 他們家，也許另外有請家教補習也說不定。(許毓凌，2006，頁 156)

同樣地，日治時期就畢業於臺南州阿里山小學校(現今嘉義縣香林國中)的邱炳

煌也表示：

阿里山小學校班級數很少，是給日本人在林務場工作員的囡仔念的，當時沒聽過有補習的事件耶！小學校內都是日本人，連老師也都是日本人，沒臺灣老師。(B-4-1)

畢業於臺南州旭小學的曾煥烈很驚訝的說：「我們那時念旭時根本沒有補習的經驗，那是光復後才有的啦！日本時代不流行補習！」(B-3-1)。而同為曾煥烈同班同學的日本人永野好德也指出：「我跟瀧山輝男(曾煥烈)那時候真的沒有留下補習，都是下了課就回家，不然就是在學校跟同學玩耍」(B-5-1)。從上述四位的說法似乎可初步推測小學校的補習文化存在性不大。但接著曾煥烈對於這種補習現象表現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我覺得應該要看老師的個性，可能會有留學生下來補習的老師，不過我覺得應該不多」(B-3-2)。綜合上述，從林姓受訪者及曾煥烈的訪談內容，可看出小學校並非一定就無補習文化的存在，但在前述四位的校園生活經驗裡，他們是沒有體驗過

⁴ 許毓凌在論文中並未透露出林先生真實姓名及就讀的小學校名。

的。

上述中的經驗是從小學校男性受訪者的觀點出發，而就小學校女性受訪者觀點而言，也是出現了同樣的現象，畢業於臺南州若葉小學的江滿足，對「補習」一詞則充滿疑惑，她回憶說：

我們那時候沒補習啦！在小學校都已經用日文學習了，根本不用補什麼習呀！那是國民政府來時才流行那套。(B-11-1)

接著曾就讀過臺南州新營小學校，後來因父親任職於臺南州大林小學校校長，隨著父親轉入並畢業於大林小學校（現今嘉義縣大林國中）的日本人佐藤玉枝指出：

沒有耶！我們念過的兩所小學校中都沒遇過課後留下來補習的事情。我也打電話問過當時日治時期曾就讀或服務於臺灣，現在還殘存散分在日本各地的這些老師們，他們也都說他們的經驗中也都沒補習這檔事。(B-6-1)

歸納上述，我們可以發現，在這些經歷小學校經驗的受訪人並無親身經歷或聽聞過課後補習的情形，研究者部分認為可能是教師個人行為的看法與林姓受訪者、曾煥烈兩人頗為相似，但研究者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小學校在學校資源、師資、設備及課程深度上均優於公學校，且文獻中記載亦證明研究者的部分推論成立⁵，又在全

⁵ 許毓凌（2007）耙梳了1899年至1940年臺灣總督府各年度學事年報及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各年度臺灣學事一覽，發現公學校經費除1899年（明治32年）、1920年（大正9年）、1939年（昭和14年）、1940年（昭和15年）等4年低於小學校外，其他年度均高於公學校的經費，且小學校的兒童每人平均教育費幾乎是公學校兒童的兩倍，可見小學校各項設備、資源的素質都高於公學校。

校都是日籍教師及普遍都是日本囡仔，再加上耳濡目染的身教、言教下，也自然地讓這些少數的臺灣囡仔及多數的日本囡仔對於熟識日語方面更快，且優於公學校的臺灣囡仔，故在小學校擁有補習經驗的囡仔相較於公學校的囡仔則可能較缺乏。

不過，就如同研究者與林姓受訪者、曾煥烈兩人對教師個人行為看法般，並非小學校就無補習的文化存在，因為許毓凌（2007）研究指出，在小學校中學童如果想要繼續升學，六年級的教師通常會將其留下來義務幫忙補習，許多回憶錄及訪談錄的學校學生，都對這段記憶印象深刻，並且感謝當時的教師分文不收，也就是說仍有部分教師課後替學生義務補習的現象存在。如日治時期就讀於臺南州旭小學的賴惠卿就指出：

當時因為我們都要升學，反而老師時常在學校幫我們義務補習，而且那時候已是二次大戰末期，所有的物資都是配給，老師還會拿「合利他命」來給我們吃，有時候也會煮紅豆湯給我們當點心。（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主編，1998，頁81）

而與江滿足就讀同學校的徐寬宏回憶指出：

那時也沒所謂的正式補習，不過當時確實有放學後留下來，差不多下午四點下課後補到五點，老師會要求全班留下來補習（大約三十人）以前日本老師都是義務補習都沒收補習費的。（B-10-1）

上述中徐寬宏的說法似乎更加驗證了研究者與林姓受訪者、曾煥烈兩人認為是教師個人的因素有關，而非當時的政策或風氣，因為就江滿足與徐寬宏就讀的時期來看，

相差只有一年，倘若校園中全都無課後補習的文化，那徐寬宏應該也不會有相關的課後補習經驗。簡言之，在小學校的場域中還是有課後補習文化的存在，且以少部分的臺灣囝仔體驗較多。

二、公學校的課後補習經驗

公學校是專為臺灣囝仔設置的初等教育場域，以臺灣囝仔為主要教學對象，雖然之後推行臺日共學制，但真正會到公學校就讀的日本囝仔根本沒有，除非是一些很偏遠或無設置小學校的地區（竹中信子，1995），故此段探討的補習經驗大部分則是以臺灣人為主，而教師方面除了臺籍教師外，尚加入兩位日籍教師的觀點來瞭解公學校中補習的情形，以下分為二個部分，分別探討公學校的補習經驗。

（一）日籍教師部分

畢業於臺南州頂六公學校的蔡廷賢回憶起課後補習的經驗時，帶著感恩的心談論

小林教師對他們的好，他回憶著說：

小林老師為了讓我們升學，除了白天認真教我們外，晚上還叫我們去他宿舍免費補習，不但不用費用，當時我們鄉下地方電燈還沒普及，加上學校中的燈火比較不順，有時都會斷電，所以教師宿舍偶爾會點油燈，萬一沒有電老師就會點給我們補習，油燈費都是小林老師出錢。偶爾還會賞我們一個「あめだま」（金柑糖）。

（B-7-1）

同樣地，畢業於臺南州佳里公學校（現今臺南縣佳里國小）的鄭春河回憶指出：

公學校日本老師佔了教員總人數的三分之二，四、五年級時，老師都是日本人。……。學校中很多老師對學生都非常照顧，將學生當做自己的小孩看待，不但補習不收錢，還常常做家庭訪問，十分關心學生的家庭環境和生活起居，和現在的老師非常不同。（蔡慧玉，1997，頁42）

接著畢業於臺南州玉東門公學校的賴彰能也指出：

那時日本老師，須田義治都會留我們下來補習，當時大約有三十多個，有家長要求的、學生主動等。三點補到五點，都是免費的，補習時一律平等。（B-2-1）

李英茂⁶在《宜蘭耆老談日治下的軍事與教育》乙書中也提到，日本教師補習的動

機讓他感動之處，他說：

五、六年級的老師也是音樂老師，叫做城所老師。他教學非常認真，由於我們是升學班，他也是免費幫我們補習。後來戰爭的時候，他被徵調到戰場，頭剃得光光的，害我們都嚇一跳。（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191）

原本在宜蘭公學校（現今宜蘭市中山國小）讀書，四年級時才轉學到臺北州蘇澳

公學校（現今宜蘭縣蘇澳國小）的呂百川先生，他對當時教師對他們課後補習及關心

的印象如下：

四年級老師藤弘秀子，個子小小的，生氣時臉紅紅的，教學相當認真。五年級老師竹本保之，是位優秀的老師，認真很教學，在數學方面老師是全校最棒的，因為孩子聽得懂，又喜歡上老師的課。當時想報考宜蘭農校的學生，老師都會免費留校補習，加強功課。（吳枝坤，2005，頁31）

⁶ 在口述叢書中李英茂並未透露出其畢業於宜蘭地區哪所公學校。

由此可見公學校中課後補習的文化相較於小學校來說，可以說非常的頻繁與常見。根據《新屋公學校沿革誌》中記載，明治43年9月1日起，每天放學後，將各學年功課比較不好的學生留下來補習，其後還增加每天上課前三十分鐘為劣等生補習，複習的科目則是國語及算術，補習生二學年21名、三學年4名、四學年3名、五學年5名。該年年初在籍學生人數125人算，留下來補習的共有23人，占18.4%，大約有兩成的學生需要接受輔導（新屋公學校，1910）。

歸納上述中關於公學校課後補習的年級數上，研究者發現大致都是在升上六年級後才有此類經驗，但劉書彥（1996）曾訪問了一位就讀小學校的賴氏女士，發現有些日本教師也是從四年級就開始幫學生作課後補習的情形，賴氏女士指出：

四年級到六年級時，每天學校下課後，我的老師便集合班上考生（想進中學就讀的學生），替我們進行兩小時日本語、算術、歷史、地理、游泳、棒球、話劇等的免費加強課程。且把我們教到好為止。這對我來說真的很高興。（劉書彥，1996，頁28）

由此可知在課後補習的經驗上，確實是依據不同教師的想法去實施與執行。此外，令研究者感到驚訝的是公學校的高等科⁷亦有相同的課後補習情形發生，在淡水念高等

⁷ 高等科的學制類似今日的初中學制，其是為了讓修讀完六年初等學校（包含小學校、公學校及國民學校）的學生，萬一無法順利考取中等學校或師範學校時，繼續修讀的一個兩年制的過

日治時期臺灣初等學校課後補習經驗初探

科的江萬澤⁸回憶日籍教師的照顧情形：

我們都對我一、二年級的老師很感念，當年我有好幾十天住老師家念書，不管老師也好師母也好，都對我非常款待和照顧，一文錢也沒收。(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主編，1997，頁968-969)

同樣是畢業於高等科的吳文象，回憶其就讀臺北州雙溪公學校(現今臺北縣雙溪國小)對於教師課後補習的動機提出說明：

老師都是日本人，很嚴格，天天為我們補習一個小時，沒收費。老師沒有強迫我們補習只是勸我們，因為要搭火車還有一個鐘頭，不如留在這裡看點書。(張炎憲編，1996，頁209)

從整個脈絡看來，日籍教師對課後補習的行為上確實偏高，不過也有少部分的日籍教師指出在公學校時並沒有課後補習的現象，如臺南師範學校畢業後，服務於臺南州新高國民學校的永野好德指出：

我服務的新高國民學校是新學校，應該沒有補習這事，而且我服務沒多久就被徵調去當兵了。不過補習的事我當時也沒聽別的老師有這樣作。(A-4-1)

上述永野好德的說法，可信度十分高，因為就心理學的閃光燈效應(flashbulb effect)而言，永野好德任教的時期正逢美軍轟炸臺灣時期，其親身在國民學校任教的情形與

渡學制，通常學生程度有一定的水準。

⁸ 在口述叢書中李江萬澤並未透露出其就讀於淡水地區的哪所公學校。

行為，應當記憶的特別清楚。不過也有可能就如其所言，因其任教時間太短，並無機會體驗到課後補習的情形。服務於臺南州玉川公學校的佐藤玉枝就本身的經驗指出沒有課後補習文化的現象，她指出：「我服務時真的是沒有補習的情形發生，其他學校我就知道了」(A-5-1)。而佐藤玉枝的說法並無錯誤，因為上述的訪談內容及耆老的口述叢書均可證明其實其它學校有存在著課後補習的現象。

(二) 臺籍教師部分

公學校中臺籍教師對課後補習的情形似乎少於日籍教師。新竹州新屋公學校(現今桃園縣新屋國小)一位當時家中比較貧困的校友—馮堯春女士，回憶當時之所以能繼續升學，多虧當時的沈月枝教師，她說：

功課好，家中有錢的才有能力繼續升學，也才會參加補習。本來我是沒有要參加補習的，沈教導特別到我家去，叫我爸媽讓我補習，不用交補習費，還到家中求父母，這真是絕無僅有的。他告訴我父母，說我是他教書二十多年來，教過最乖的孩子。很有潛力。(何憶如，2003，頁124)

對於臺籍教師補習的經驗，臺南州玉川公學校的畢業校友，張岳揚回憶指出：

我們那時候可能臺灣人六百多個要取六十個，剩下的日本人，他們有保障一百個內有三十個，所以可以說中學難考，嘉農難考，師範的更加難考，這之間我們那一屆平均七個就是當時玉川學校以來最好的一次成績。別間的我不知道，我們那一班是臺灣的老師，是臺籍老師叫楊振男老師，那時候在幫我們補習沒有收補習費，在他們家補習，連電費也不跟我們收錢，還不打緊，師母跟老師的媽媽還煮綠豆湯給我們喝。(B-8-1)

此外，在《宜蘭耆老談日治下的軍事與教育》乙書中，林嬌娥回憶中也曾提及臺籍教師替她們補習的情形，她指出：

四到六年級的老師，分別是藍金鐘老師、林添輝老師及竹田老師。當時我們為了要考取蘭陽高女非常辛苦，因為還要跟日本人競爭。這三位老師非常任勞任怨，每天下課都義務替學生補習，還提供測驗卷給我們練習，這些全都是免費的。(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191)

任教於臺南州官田鄉第二國民學校的許台指出：

我是師範學校五年制畢業的，我教過高年級半年多，因為當時已經在調兵去南洋準備打仗，學校很多日籍老師都被徵調，後來校長說我是師範的，非常有資格，要我任教六年級，我曾有過好幾次留幾個想再繼續升學的下來「指導」，不過沒多久臺灣就遭受美軍轟炸，所以要幫他們補習也都沒辦法了。(A-1-1)

從上述的訪談內容及蒐集相關的口述歷史叢書中，我們可以發現臺籍教師在課後補習方面所顯示的資料數據較少，而這樣的情形似乎會誤導我們對公學校中臺籍教師是觀感，但這之間的疑問，可從蔡元隆的研究結果得到解答。蔡元隆(2008)指出，由於日籍教師在語言上佔有絕對的優勢，普遍擔任高年級教師。相對地，臺籍教師則擔任低年級居多，除非有較資深且畢業於正統師範學校的教師方可擔任高年級教師。故我們對於臺籍教師在課後補習少於日籍教師的疑點似乎得到解答。

資料顯示公學校中有少部分日本團仔或教師未有課後的補習經驗，當然這種情況

也會出現在臺灣囡仔或教師身上。日治時期就讀臺南州嘉義女子公學校的楊秀竹指出：「我們以前下課沒有在學校補習」(B-1-1)。而畢業於臺北州二重埔公學校(現今臺北縣二重國小)的林春木也指出無課後補習現象，他說：

當時不講究補習，也沒鼓勵升學，以我們那屆來講(日本時代第二十五屆)，大概有一百人左右，真正升學只有三人，女生一個都沒有。(張炎憲編，1996，頁199)

另外就讀於高雄州里港東國民學校的吳五田指出：「我那時候沒有課後補習，那時已經開始戰爭了，老師都帶著我們躲空襲」(B-9-1)。吳五田的說詞可能較無法客觀地瞭解課後補習的經驗，因1945年日本戰時，他只唸到三年級並無體驗過先前提及通常要到六年級才會有補習的經驗。不過我們從楊秀竹及林春木的訪談內容中仍可發現有少數臺灣囡仔沒有經歷過課後補習。其實這種情形並不只限於臺灣本島，連離島的臺籍教師也有這類的體驗，師範學校畢業後，服務於澎湖廳望安國民學校將軍澳分教場(現今澎湖縣將軍國小)的邱炳煌回憶著說：

我服務的學校非常的偏僻，還要坐船過去，在外島當時生活過的很困苦，誰還會想補習繼續升學呀！所以我記憶中沒幫學生課後補習，也沒聽說有老師幫臺灣囡仔補習的風聲。(A-3-1)

同樣也是畢業於臺南師範學校，後被派往澎湖廳小池角國民學校(現今澎湖縣池東國小)、澎湖廳大嶼國民學校(現今澎湖縣七美國小)的曾煥烈也指出：「我們那時

候在外島教書並沒有幫困仔補習的經驗」(A-2-1)。故我們可以發現臺灣本島及離島仍有少部分教師與學生無課後補習學校經驗。

三、日治時期另類的補習模式

(一) 到教師宿舍補習

在公學校補習方面，除了在下課後留在學校接受教師「指導」外，甚至還有些日籍教師為了學生成績更加優秀，在學校課後補習完後，還讓學生到教師的宿舍去接受學校課後補習完後的另一個課後補習，就讀於臺北州蘇澳公學校（現今宜蘭縣蘇澳國小）的呂百川：「有時候還會到老師家中特別指導，時間要是晚了一些，老師還會為我們準備小點心」（吳枝坤，2005，頁 31）。就讀於臺北州二重埔公學校（現今臺北縣二重國小）的葉金火指出：「有位姓陳的同學，師範沒考上，他算很優秀，老師叫他到宿舍，為他補習，沒有向他拿錢」（張炎憲編，1996，頁 11）。就讀於臺南州東門公學校的賴彰能：

教我們那個年青的須田義治日本老師是單身漢，所以晚上還又另外叫我們五個去老師宿舍補習，後來這五個去考，考中嘉中的有四個。(B-2-2)

畢業於臺北州金山公學校（現今臺北縣金山國小）的賴炳傑回憶指出：「晚上有些日本老師住宿舍沒伴，有時會叫我們去和他做伴，我們也在那邊多少讀點書」（張

炎憲編，1996，頁121）。黃文樹在〈自學典範曹永和與藝術大師朱銘成長特徵之共通性及其教育啟示〉乙文中也提到對自學典範曹永和院士日治時期對補習文化的經驗：

曹永和在小學（公學校）三年級後，因搬家，由士林公學校轉學到太平公學校。六年級的日本導師平野正義，富瞻教育熱忱，不但主動、免費幫學生補習，而且開放自己的宿舍給學生自修，甚至可以過夜。（黃文樹，2002，頁306）

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日籍教師除了欲提升學生成績外，研究者認為部分原因是因為許多日籍教師都是離開日本內地到臺灣的「羅漢仔」，回到宿舍後也會想家及欲與他人互動，而一個人在臺灣非常孤獨，所以也會希望有人可以陪他們聊天、做伴，理所當然地叫囝仔到宿舍補習也成為日籍教師排解鄉愁的方法之一。

（二）出錢集資補習

在課後補習的文化上，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就是家長會集資出錢請教師來家庭幫學生補習，畢業於臺南州嘉義女子公學校的楊秀竹指出：

我們以前下課沒有在學校補習，是下了課後回到家，附近的鄰居一起出錢找個公學校的老師回來補習，一班大約十三、十四個左右，有來自玉川公學校、嘉義女子公學校、東門公學校的男女生。（B-1-1）

就讀於臺北州三重埔公學校（現今臺北縣三重國小）莊壬辰也指出：

日本時代，補習比較少。有錢人士不會補習，而是去請家教，那時老師很少將學

日治時期臺灣初等學校課後補習經驗初探

生留下來課後輔導，大都是由六、七個家庭合起來請一個老師來教。(張炎憲編，1996，頁76)

從上述的現象，我們可以客觀的詮釋為，雖然在被殖民的統治下，但為了求自身家族的地位提升及子女的成就，家長們也深信教育是最有辦法製造社會流動 (social mobility) 的一個途徑，所以會各自或集資出錢請教師回家裡教學生。

(三) 課後補習合法嗎？

前述的兩項另類的補習模式，似乎讓課後補習行為也延伸至放學後，但課後補習在當時究竟違法嗎？因為有少數受訪者及文獻中指出補習文化在當時是禁止的，如畢業於臺南州玉川國民學校的歐識回憶說：

我們到六年級要考中學，那時候老師不知道什麼原因禁止都不可以補習，不可以有課餘的課，我記得很清楚，四年級那老師還沒，六年級那老師就說你們自己準備去買參考書，自己用功。放學了，有的要考有的不要考，要考的就留在那邊自習，因為老師不能教你，不然被教導知道了老師會被記過喔！就是不能補習就對了。我們就自己自動自發拿參考書在那邊看看，不會的拿去問老師，老師坐在旁邊的桌子。(B-12-1)

又如畢業於臺中州霧峯公學校 (現今臺中縣霧峰國小) 高等科的郭傳發也說：

就讀霧峯公學校高等科時，我班上有四十六位同學。第一年的學期中，便有人陸續向教育係和派出所投書，檢舉我班上有學生在學校補習。由於那時禁止補習，補習的風氣很不盛，因此老師便想查出投書者，但是沒有同學肯承認。(蔡慧

玉，1997，頁 109-110)

而楊秀竹同樣指出補習在當時是禁止的行為，並說出她所知道的原因，她說：

以前是禁止補習，都是偷偷在樓上的閣樓上。因為第一，晚上教書的聲音會很大聲，會吵到人。第二，好像有法令規定不可以晚上上課，因為會有損小孩身心健康。(B-1-1)

從上述楊秀竹的口述內容，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研究者查閱了日治時期臺灣最具影響力的臺灣總督府 (1937) 編輯的《臺灣法令輯覽》及臺灣教育會 (1943) 所出版的《臺灣學事法規》，發現並無相關法條禁止課後補習，但我們也無法斷然的認定課後補習是違法行為，只能猜測極有可能是當時學校校長的規定，抑或是州、廳的部分規定，因為畢竟有這樣的特例存在。

四、補習的目的

(一) 無私的教育愛

雖然臺灣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在政治上被歧視為二等的日本國民。但每一個臺灣仔管在臺日籍教師的眼睛都是一塊未雕琢的璞玉，都有無限的發展可能，所以在每個臺日籍教師眼中，努力的教導學生，讓學生出人頭地是他們最大的願望⁹，因此從

⁹ 雖然臺日籍教師都會很努力的教書，但事實上仍然有所差別。蔡元隆 (2008) 及蔡元隆、侯相如 (2008a, 2008b, 2009) 認為臺籍教師是本著臺灣意識，透過教學轉化讓臺灣仔能努力

課後補習的目的也變的清晰可見。如畢業於臺東廳臺東公學校（現今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小）的胡筆勞指出：「六年級時，要升學的參加『受験組』，由老師義務補習」（臺東縣後山文化工作協會，1999，頁 77）。接著畢業於高雄州里港公學校（現今屏東縣里港國小）的楊明義提到他就讀高等科時候的日籍教師牧春美：

牧老師是全心全意在指導我們的，午飯後常常為我們讀《魯濱遜漂流記》，引起我們看課外讀物的興趣。暑期很長的時間，他不收分文為我們補習功課，鼓勵我們升學。每天下午指導到天黑，室內看不見字了才放學。（楊明義，1987，頁 12）

畢業於臺北市蓬萊公學校（現今臺北市蓬萊國小）的周真真指出：

我小時候補習都不用錢，日本老師也不讓我們每一個都補習。你家有錢，他並不一定歡迎你，他也不集中一個班級的人數來開補習班。你家經濟、學問有一定的水準，他才會讓你補習。那時後日本老師都不收我們的錢。（張炎憲編，1996，頁 63）

又如洪陳女士回憶指出¹⁰：

老師都是很認真、很辛苦的教書，我認為日本人在臺灣最大的功績就是「愛的教育」，當時的老師都很照顧學生，家境比較不好的學生，也有老師可以免費幫學生補習。（許毓凌，2007，頁 55）

畢業於臺南州玉川公學校的張岳揚指出：

念書並出人頭地，以達「隱性抗議」之目的。另一方面，蔡元隆（2008）認為日籍教師則是以了尋求一種精神上的回饋居多。

五、六年級因為要拼考試，像我們那個楊振男老師那樣子，可能甲組跟丙組的沒有這種補習制度(到老師家補習)，有是在學校補習而已，日本老師也是有在補習，沒有說只有臺灣老師那麼認真叫去他們家補習，晚上煮點心給學生吃，可能我們這一屆說起來，日本老師只有在學校補習而已，沒有說叫你到老師家補習，我們的楊老師是把我們叫回他家補習，認真的程度不比日本老師差。(B-8-1)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概略的發現這些臺日籍教師他們的出發點都是為了讓臺灣國仔能考取中等學校或師範學校，而在補習的目的上，無疑就是要學生能更上一層樓。

(二) 教師間教學成效的較勁

日治時期的教師地位崇高，但其獲得尊重的途徑則是來自於擁有優秀的教學能力及良好的教學成果，這也無形地演變出不只是臺日籍教師間教學成效的較勁，更是日籍教師面子上的較勁。畢業於臺南州若葉小學的徐寬宏回憶指出：

那時候本來是兩班，後來拆成三班，三個日本老師，教師之間教出來的學生成績就會成為他們互相激勵的教學動力，會比較看誰今年教出來的考的比較多師範學校、中等學校、專修學校的！不過他們不會很卑鄙的競爭，很有大和魂精神。(B-10-1)

畢業於臺東廳臺東公學校(現今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小)的莊丁波指出：

民國廿八自己讀五年級，學校決定組成升學特別班，專人指導訓練，只為了考初中爭好成績為學校討面子。當年主其事的是岩崎校長，負責特別班的老師是宮協，.....，後來宮協還因為指導升學班成績突出，獲調升初鹿國小的校長。(臺

東縣後山文化工作協會，1999，頁4)

¹⁰ 許毓凌(2007)在文章中並未透露出陳洪女士真實姓名及就讀的小學校名。

日治時期臺灣初等學校課後補習經驗初探

畢業於臺南州東門公學校（現今嘉義市民族國小）的賴彰能也說：

我們念東門公學校時跟玉川公學校成績競爭很激烈，我六年級時的日本老師須田義治責任感、自尊心很重，再加上校譽，所以老師們都很用心的再幫我們加強，希望我們能為校爭光。我們當年一班考上四個嘉中，一整個學校要是考上四個嘉中就很不了起了，因為當時嘉義中等學校只有五十個名額，但考生數自來自整個臺南州。(B-2-1)

從上述的徐寬宏、莊丁波及賴彰能等三人對日籍教師在教學上的成效看出，除了為校爭光外，日籍教師為了展現教師該有的地位，則透過教學來證明自身的價值與優越感。

而在臺籍教師方面，則也有這樣的信念存在，服務於高雄州里港東國民學校（現今屏東縣里港國小）的吳德恩指出：

我每一天都會下課後，又多花一些時間幫學生複習一下功課，因為我想讓我們臺灣囡仔比日本囡仔更有出息，而且我並不覺得我會教輸那些日本人。(侯相如、蔡元隆，2008b，頁87)

新竹州新屋公學校（桃園縣新屋國小）的馮堯春解釋當時臺籍教師課後補習的動機：

那時候的老師補習都是不收補習費的，只有學生考上之後，會拎著兩隻閩雞、一譚酒到老師家中謝謝老師這樣而已。我們二十九屆相當優秀，共有三十五人考上中學，其中四個新竹中學、二個商職、十一個桃農、十八個中壢農校與家政女校。（全國以宜蘭、嘉義、桃園農校分別排名一、二、三）那時候老師補習也不是為

了賺錢，而是為了「展現教師個人能力」。(何憶如，2003，頁124)

最後畢業於臺南州玉川公學校的張岳揚指出：

我們當時三個班，一班六十五個，算起來一百八十幾個而已，我們楊振南老師，是三個班中的唯一臺灣人，那時候考上中等學校的三個班平均都是七個人，所以破紀錄，三十三屆破以前的紀錄，一個班級考上七個，所以楊老師煮綠豆湯給我們吃，他不會因為說我家貧窮所以看不起我，那時候他曾有對我們說一句話：「我覺得你們考這樣我非常光榮」，和日本人競爭不輸給他們，那時候帶我們去旅行，去南靖製糖會社。(B-8-1)

從上述吳德恩、馮堯春及張岳揚的口述內容中，研究者認為臺籍教師的教學信念中確實隱藏著臺灣意識，因為蔡元隆(2008)及蔡元隆、侯相如(2008a, 2008b, 2009)的研究也發現臺籍教師在教學上確實有著不同於日籍教師的臺灣意識，因此課後補習已經不只是教師間展現個人能力那麼單純，已經帶有反思後殖民地的情結存在。

伍、結論

依前所述，本研究有六項結論：

- 一、不管是小學校或公學校都存在著課後補習的現象，僅只有少數的公學校臺日教師及臺灣囡仔沒有課後補習的經驗，從文獻與訪談內容中更發現小學校的日籍教師及臺日囡仔極少有課後補習的經驗。

日治時期臺灣初等學校課後補習經驗初探

- 二、研究者認為小學校之所以極少有補習經驗，除了教師個人風格外，應該是小學校在學校資源、教師、設備及課程深度上均優於公學校，自然地讓這些囡仔對於熟識日語方面更快，且優於公學校的臺灣囡仔，故在相較於公學校的補習經驗上，小學校囡仔則可能較缺乏。
- 三、在小學校、公學校中不管是臺日籍的教師都是免費幫學生補習，並沒有收取任何的酬勞。
- 四、臺日籍教師在課後補習呈現的數量上，日籍教師均普遍多於臺籍教師，這並不是因為臺籍教師偷懶或不認真，而是因為擔任六年級教師均以日籍老師居多，除非是非常資深且是正統師範學校畢業的臺籍教師方可擔任之。故大部分的受訪者回憶課後補習時均會回憶到日籍教師居多。
- 五、課後補習除了放學後在校內補習外，尚有到教師宿舍補習及集資出錢補習的兩種情形及禁止補習特例出現。
- 六、課後補習的目的除了讓學生考上理想的學校外，間接的也形成了教師間展現個人能力的指標。此外，臺籍教師在課後補習的動機尚潛藏著一種臺灣民族意識的展現，認為臺灣囡仔透過教育機會均等後是不輸日本囡仔。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吳文星 (2000)。「近十年來臺灣關於日治時期教育史研究之動向」摘要。《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12，20-26。

吳文星 (2001)。近十年來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研究之動向 (1991~2000)。《臺灣師大歷史學報》，28，221-238。

吳枝坤 (2005)。《宜蘭縣蘇澳國小百年發展史之研究 (1900~2005)》。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花蓮師範學院，花蓮。

李新民 (2001)。《課後托育理論與實務》。高雄：麗文。

何義麟 (1986)。皇民化期間之學校教育。《臺灣風物》，36 (4)，47-88。

李菀蓓 (2007)。《台南縣市國一學生在國小階段參與課後補習與其選擇就讀國私中相關性之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南大學，台南。

何憶如 (2003)。《桃園縣新屋國小校史之研究 (1905-2003)》。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

日治時期臺灣初等學校課後補習經驗初探

李穗嘉 (1990) 。 *日據時期臺灣音樂教育及教科書之剖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私立文化大學，臺北。

林玉体 (2003) 。 *臺灣教育史*。臺北：文景。

周婉窈 (1997) 。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日語時期臺灣公學校第三期「國語」教科書的分析。 *臺灣史研究*，4 (2)，7-53。

周婉窈 (2001) 。失落的道德世界—日本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之研究。 *臺灣史研究*，8 (2)，1-63。

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1996) 。 *宜蘭耆老談日治下的軍事與教育*。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張炎憲編 (1996) 。 *臺灣人教師的時代經驗*。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張春桂 (2005) 。 *國小學童課後補習狀況與家長決策行為之探討—以台南市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南大學，台南。

教育部 (2004) 。 *補習及進修教育法*。臺北：教育部。線上檢索日期：2008年12月20日。

網址：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H0080002>

許佩賢 (1994) 。 *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未出版之碩

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北。

許佩賢 (1996)。從戰爭期教科書看殖民地「少國民」的塑造。*臺灣風物*，46 (1)，
63-93。

許佩賢 (2005)。*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

許毓凌 (2006)。*日治時期小學校臺灣兒童的跨文化經驗*。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

許毓凌 (2007)。日治時期小學校臺灣學生的教育實態(下)。*臺灣風物*，57 (3)，53-68。

黃文樹 (2002)。自學典範曹永和與藝術大師朱銘成長特徵之共通性及其教育啟示。*屏東師院學報*，16，295-318。

楊明義 (1987)。*憶*。屏東：東陽。

臺東縣後山文化工作協會 (1999)。*臺東耆老口述歷史篇*。臺東：臺東縣立文化中心。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主編 (1997)。*臺北縣鄉土史料*。臺北：省文獻會。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主編 (1998)。*嘉義市鄉土史料*。臺北：省文獻會。

劉書彥 (1996)。探討日本語教科書中殖民統治對臺灣社會之觀點。*臺灣風物*，46 (3)，
15-67。

日治時期臺灣初等學校課後補習經驗初探

蔡元隆 (2007)。真平等？或假平等？—從日治時期 (1919-1941) 的臺日共學制談初等教育本質上的歧視。*國教之友*，86 (1)，74-81。

蔡元隆 (2008)。日治時期嘉義市公學校的思想掌控及學校生活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嘉義。

蔡元隆、侯相如 (2008a)。日治時期皇民化的幫兇？—五位國民學校臺籍教師對抗殖民霸權的反省實錄。*文化研究月報*，80。線上檢索日期：2008 年 12 月 20 日。網址：
<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80/criticism01.htm>

蔡元隆、侯相如 (2008b)。初探日治時期 (1939-1945 年) 公學校臺籍教師的隱性抗議—從薪俸制度的差別待遇談起。*人文研究期刊*，4，75-94。

蔡元隆、侯相如 (2009)。臺灣日治時期初等學校體罰現況初探：口述歷史研究。*中等教育季刊*，60 (1)，36-52。

蔡慧玉 (1997)。走過兩個時代的人—臺籍日本兵。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蔡錦堂 (2006)。戰爭體制下的臺灣。臺北：國立編譯館。

鄭梅淑 (1988)。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私立東海大學，臺中。

蔡元隆 朱啟華

謝佩錦 (2005)。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教師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新竹。

外文部分

竹中信子 (1995)。 *殖民地臺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明治篇*。東京：田畑。

佐藤源治 (1943)。 *臺灣教育の進展*。臺北：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

新屋公學校 (1910)。 *新屋公學校沿革誌*。臺北州：作者。

臺灣教育會 (1943)。 *臺灣學事法規*。臺北：帝國地方行政學會。

臺灣總督府編 (1937)。 *臺灣法令輯覽*。臺北：帝國地方行政學會。

文稿收件：2009 年 02 月 24 日

文稿修改：2010 年 08 月 20 日

接受刊登：2010 年 09 月 20 日

Student Experiences of Supplementary Elementary School Lessons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Yuan-Long Tsai* **Chi-Hua Chu****

Abstract

* First Author (Corresponding Author) : Part-time lecture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To Ko University

** Second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student experiences of supplementary elementary school lessons after school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cluding Taiwanese public schools, Doka Public Schools and Taiwan Kyoiku-rei schools)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1927-1945). The study adopts the oral history of thirtee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nd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elementary school as the primary sources datum, referred by series books of oral history. Furthermore,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software “ATLAS.ti” is used for coding, categor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datum. The study has six conclusions: (1) Supplementary school lessons existed not only in Taiwanese public schools but also in Doka Public Schools. However, it is less in Taiwanese public schools; (2) The reason for the difference might possibly be that Doka Public Schools have more resources from the government; (3) The teacher did not take any remuneration. Moreover, all the supplementary school lessons are free; (4) Japanese teachers had more students of higher grades who needed more supplementary school lessons; (5) besides having supplementary school lessons on campus, students had lessons in teachers’ dormitories or concentrated funds hiring teachers for the lessons; (6) The purpose of having supplementary school lessons is not only for the goal of entering into ideal schools but showing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ies.

**Keywords: elementary school, supplementary school lessons, teaching ability,
Taiwanese education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